

新派武侠小说发展回溯

◆陶 娅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五年制教学部)

摘要: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学形式,中国武侠小说始自汉代,唐宋明清绵延不绝,历史源远流长。中国武侠小说作为我国优秀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小说中的一个流派,这个流派从古至今经历了三大历史演变,这就是:“中国古代武侠小说”、“中国旧派武侠小说”和“中国新派武侠小说”。

中国的武侠文化源远流长,从先秦两汉至魏晋南北朝,中国武侠小说就已经萌芽,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中国武侠小说的发展,经历了由简单到丰富,由娱乐性到审美性的发展过程。武侠小说多以侠客和义士为主人公,描写他们行侠仗义的行为,歌颂主人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施仁行义的武侠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至,武侠小说进入了新派武侠小说时期,这段时间是中国武侠小说发展的黄金时期,一时间人杰辈出,经典不断。但是由于大陆与台湾独特的政治历史背景,使得该段时期武侠小说有着非常明显的地域局限,虽然大部分学者都表示这时期武侠小说为“港台新派”,但若从发展规模、社会影响力来看,说新派武侠小说诞生于香港一点都不为过。

武侠小说作为通俗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类,古已有之,但是“武侠”一词却是20世纪初才产生的新词。“侠”之一词最早见于战国时期,在《韩非子·五蠹》中有“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认为在传统的“公义”之外,有着侠客的“私义”,亦即侠客的道德价值体系,这个体系的内容模糊而丰富,从行为上看,大体上体现了尚勇、任誉、聚徒、犯禁的特征,此应为“武侠”最早的由来。

在武侠小说漫长的历史演变中,新派武侠小说是在旧派武侠小说基础上从五十年代开始在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兴起的,是最有代表性的武侠小说。新派武侠小说是纸上武侠的新阶段,理想和言情色彩淡化,是中国通俗文学的一个登峰造极的发展,这段时间是武侠小说发展的黄金时期。不可否认港台新派武侠小说是从民国旧派武侠小说的基础上借鉴发展升华而来的,但是民国旧派和港台新派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武侠小说研究领域的一个薄弱点。无论是阅读还是研究,都普遍存在着重新派而轻旧派的现象。实际上,任何一个时期新文学现象的出现都无法脱离前代的影响,只有将其放置到与前代的关系中,才能看清它的实际价值。之所以将新派武侠小说与旧派武侠小说区分开来,是由于旧派武侠小说自身的局限性以及新派武侠的发展壮大。

新派武侠小说诞生在香港,虽属偶然,但又有必然因素。1949年大陆解放战争结束以后,大陆武侠小说和其他一些通俗小说被认为是封建主义糟粕,受到压抑和排斥,特别是“文革”之后,武侠小说在大陆基本销声匿迹;而在台湾,50年代初,台湾当局以戒严法的名义查禁一切“有碍民心士气”的作品,武侠小说包括在内。50年代末,台湾当局又以“暴雨专案”全面取缔包括大陆、香港出版的新旧武侠小说,共计有500多部,于是武侠小说在台湾也没有了市场。武侠小说在海峡两岸都被视为毒草或不良读物,陷入万劫不复之地,留在大陆的武侠作家纷纷辍笔。国共两党虽然政见不同,但在对待武侠小说的态度上却是惊人的相似。

与大陆、台湾相比,1949年之后香港的文化环境在意识形态上不具有严格的规定性。武侠小说的传统、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意识,再加上面向西方的社会环境,使得香港拥有这一种得天独厚的开放性,成为50年代初衔接本世纪上半叶武侠小说的唯一可能的地方。梁羽生的作品虽然在香港左派报纸上连载,但却进不了大陆,也进不了台湾,金庸亦是如此。新派武侠文学勃兴于香港,盛行于海外,这是一条坎坷而曲折的道路,但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却是具有意义的、不可或缺的一环。

香港新派武侠小说的成就存在着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并且是在旧派武侠摇篮中启蒙而后茁壮成长的。纵观武侠小说发展史,与古代相比,港台新派和民国旧派之间有着更加密切的联系。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小说类型,其基本精神和叙述方式,并没

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宋琦怀疑当初立论区分新、旧武侠小说者,更多的是出于地域和政治上的考虑,而不是由于艺术把握的需要。新派武侠小说发展的初期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与之前的旧派武侠小说为“五四”新文学所不屑,在当时没有地位,只能在一些小报上刊登,难登大雅之堂,读者大多数为中下层人士不无关系。旧派武侠的窘境很难得到迅速转变,武侠必须做出转变才能重获新生,这一时期出现了梁羽生、金庸和古龙,三人并称中国武侠小说的三大宗师,其影响力至今不衰,开创了近代武侠小说新纪元,将武侠文学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梁羽生曾说:“开风气者,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从《书剑恩仇录》到《鹿鼎记》,十五部武侠小说部部经典,其主题思想之深刻、人物个性之鲜明、文化底蕴之深厚,影响着一代代的读者,甚至形成“金学”。一大批杰出的武侠小说作者升华了武侠小说的主题,提高了武侠小说的品位,用新文艺手法去构思全书,从外国小说中汲取新颖的表现技巧,把武侠、历史、言情三者结合起来,将传统公案与现代推理揉为一体,使武侠小说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如梁羽生认为“武侠是‘以武为手段,行侠是目的’”,金庸则提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概念。新派武侠小说大家的出现以及武侠小说自身文化品位、写作风格、表现手法的进步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发展铺平扫清了道路,促进了其发展。

总的来说,旧派武侠小说孕育了新派武侠小说的萌芽,并且由于香港相对自由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于1949年之后催生了新派武侠小说。在新派武侠小说形成后,经历了初期的艰难和后期一步步丰富和升华主题的过程,慢慢发展为大家耳熟能详的现代武侠小说。在新派小说发展期间,诞生了一大批大师如金庸、古龙、梁羽生等,他们为中华武侠小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曹亦冰.论中国武侠小说从古至今的演变[J].明清小说研究,2003(1):74-78.
- [2]宋琦.武侠小说从“民国旧派”到“港台新派”叙事模式的变迁[D].山东:山东大学,2010:7.
- [3]赵稀方.市场消费与文化提升——论香港新派武侠小说[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0(5):53-55.
- [4]刘晓军,谭帆.新闻意识与商业行为——报刊连载对清末民初章回小说文体的影响[J].中国文学研究,2010(4):43-46.

作者简介:陶娅(1962年7月-),女,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学历本科,职称副教授,单位:呼和浩特职业学院主要研究方向:教育文学

